



殷海光

全集

10

政治與社會（下）

殷海光 著

復得讀君之
諸華學述
無不精
大談法律
若天某一人
國同仁暨
簡而發
手書敬志
敬重先生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殷海光畢生筆耕不輟，思想遺產，豐富多樣。他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文字，具體揭露了當時諸般丑怪鄙陋的政治社會現象，總能激濁揚清，發人深省；他的針砭所及，從思想理知的整體脈絡著眼，好比黃鐘大呂，振聵發矇。本卷輯佚補闕，儘可能總匯相關著述之大成，正是瞭解殷海光的現實關懷最完整的文本，也是研究殷海光的思想變遷軌跡不可或缺史料。

一九四〇年代中末期的中國，內戰方殷，殷海光以一枝健筆在言論界開始嶄露頭角。來臺之後，殷海光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主要言論舞臺，既積極鼓吹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理念，也激烈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恣意妄為。殷海光的筆鋒所向，秉持「是什麼，就說什麼」的基準，理路曉暢，字裡行間更積蘊道德尊嚴的激情，屢屢激動蟄伏的人心，更彰顯自由主義者堅定不渝追求理想世界的人格光輝。

「大江東流擋不住」。自由、民主與人權等理想，永遠是人類的共同奮鬥目標。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世界裡，如何真正實現這些理想，本是沒有終點的事業。時空變異，殷海光思索這些課題的思想遺產，仍猶如滾滾江濤，奔流無止，既是促使我們跳脫各式「政治神話」囚籠的精神動力，也是鼓動我們尋覓理想現實處境的思想資源。

殷海光全集 10

ISBN 978-986-02-8332-7



9 789860 283327

00550



GPN : 1010002112

定價 新臺幣550元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政治與社會 / 殷海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 臺大發行, 2011.06
下冊 ; 14.8 * 21公分. -- (殷海光全集 ; 8-10)
ISBN 978-986-02-8330-3 (上冊 : 精裝) . --
ISBN 978-986-02-8331-0 (中冊 : 精裝) . --
ISBN 978-986-02-8332-7 (下冊 : 精裝)
1. 政治學 2. 社會學 3. 文集
570.7 100011784

殷海光全集 10 政治與社會 (下)

作 者 殷海光
叢書主編 林正弘、潘光哲、簡明海

總 監 項 潔
責任編輯 紀淑玲 助理編輯 張凱喻
文字編輯 孫德銘 美術編輯 于乃燕

發行人 李嗣浯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
印 製 飛燕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1 年 6 月
版 次 初版
定 價 新臺幣 550 元整

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E-mail : ntuprs@ntu.edu.tw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 : 2365-9286 傳真 : 2363-6905
10087 臺北市思源街 18 號澄思樓一樓
電話 : 3366-3991~3 轉 18 傳真 : 3366-9986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 : (02) 2518-0207
10485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一樓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ISBN : 978-986-02-8332-7

GPN : 1010002112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Contents

再論「君主的民主」	889
不要怕民主！	894
張其昀部長的原子迷	900
反民主的民主	906
雷諾事件底檢討與建議	913
是什麼，就說什麼	941
反攻大陸問題	949
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	960
讀胡適先生在聯大的演說	970
從衛星放射到彌賽亞精神——寄語美國朋友	977
我們的教育	986
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	993
請勿濫用「學術研究」之名	1005
學術教育應獨立于政治	1009
為學術教育工作者請命	1016
政治的神經衰弱症	1023
自由民主是反共的活路	1030
創設講理俱樂部	1041
論二分法	1056
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	1065
為教師爭人格	1079
認清當前形勢・展開自新運動 ——向大陸作政治進軍！	1089

教育的轉機	1100
你要不要做人？	1108
自由中國之路	1120
我們走那條路？	1128
烏煙瘴氣的政治活動在臺大！	1142
「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	1148
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1156
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	1166
我們要有說真話的自由	1171
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1177
大江東流擋不住！	1199
《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	1207
我看雷震和新黨	1210
法律不會說話——因雷案而想起的	1217
雷震並沒有倒——給李萬居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1221
權威與權力	1225
這樣的紅衛兵	1236
紅衛兵是義和團嗎？	1246
自動的把膿包戳破了！	1255
狂徒的暴跳	1264
民主的優點	1273
文化的自殺	1283
向墳墓進軍	1292
窯洞心理的分析	1301
背反的轉變	1311
大地的震顫	1321
剖析國民黨	1329

再論「君主的民主」

《中國一周》週刊第三三七期刊載了一篇社評。這篇社評的標題是〈糾正《自由中國》的謬論〉。我們看到這個標題之出現，衷心深感欣慰。我們所欣慰的是，該社此舉表明係以言論對言論，而不是以巨棒對言論。這一事實，證明自由中國尚有自由的氣息，實際的情況非若外間傳聞之甚。這是中國民主前途一線的希望。在我們看來，只要是以言論對言論，而非以巨棒對言論，是非曲直總有明白的一天。

照常識來說，自居於「糾正」別人的「謬論」之地位者，至少自己之所言必須站得住腳。我們見到〈糾正《自由中國》的謬論〉一文以後，以誠惶誠恐的心情，敬謹接受的態度，細心閱讀，準備接受「糾正」。不料讀過全文以後，竟大失所望。我們發現該文所論，很少與民主有何相干之處。我們現在把所見的要點指明出來：

首先，我們不能明瞭愛國與民主有何特殊的關聯。張氏在

《政論周刊》八十八期上的大文〈民主政治三大真諦〉中，將「愛民」列為「民主」三大「真諦」之一，又說「愛民」必須「愛國」。《中國一周》週刊這篇社評又強調此說。既然如此，那就表示「愛國」與「民主」有不可分的特殊關聯。然而，就我們之所知，極權政治，專制政體，也無不強調愛國。「愛國」與「民主」並沒有不可分的特殊關聯。以張氏學識之淵博，諒不會不知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流是愛國的，而且恐怕是「非常愛國」的。即令是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鼓勵俄國人從事「偉大的愛國戰爭」。然而，這些人不都是民主的死敵嗎？講求民主的人，沒有不愛國的；「強調」愛國的人，不見得就忠心民主。

《中國一周》的這篇社評又徵引林覺民烈士等人的言行證明「愛國」與「民主」有關，這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林覺民烈士這個類型的人物之思想，站在「革命」的觀點看，是可貴的。那是「拯斯民於水火」，「吾儕不出，如蒼生何」之類的思想。這種思想只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與民主何干？該社評作者動輒引用「革命先烈言論」，在彼固已成神經反射習慣，但是總弄得文不對題。不錯，黃花崗烈士「我死則國生」的話，是「用血寫的」。然而，這是搞「革命」，不是行「民主」。搞「革命」可以用「血」來搞，行民主卻不能。民主不是「鮮血之花」。民主見了「血」，便會退避三舍。民主是理智，商討，與和平的產品。「民主」與「革命」是不能同時進行的。該文作者卻將此二者扯在一起，想用「革命言論」來證明「民主的真諦」，豈非南轅而北轍，愈扯愈遠？

這篇社評為了申述其所謂「民主的真諦」，引用「地方自

治實行法」為證。實行民主的國家固然實行地方自治，然而實行地方自治的國家是否就是民主，因而我們可否拿「地方自治實行法」來證明有民主，這個問題且留待讀者去判斷。我們現在所要指出的，是該文說「中國古代哲理，本重教養兼施」；而且「漢唐盛時，保民理民之責並未放棄」。該文作者徵引「漢唐盛世」來證明「教民」與「養民」之應為，當然不會不知道「漢唐盛時」中國尚在君主專制時代，而現在則是中華民國四十五年。該文作此徵引，用意是否要現在的中華民國實行「漢唐盛時」之「君主的民主」呢？

該文又說：「最可笑的，《自由中國》編者一面捏造名詞——『君主的民主』——想加害於人，一面又說張先生『這種說法簡直是從共產黨那裡原封不動地抄來的。』這使我們想起一九四四年羅斯福總統生平最後一次在波士頓芬威球場的競選演說：『有些人（指反對黨）說我是一個君主主義者（monarchist）他們同時又說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不能兼任此兩者。』當時全場聽眾哄堂大笑。」想不到羅斯福十幾年前競選時的口邊語，竟在今天被捧作救命符。可惜得很，該社評作者不知道一個人既可以是「一個君主主義者」，又可以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一點也不「可笑」，而且平常之至。史達林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嗎？同時，他不又是一個新沙皇嗎？

總而言之，我們拜讀了這篇社評，除了讀到最後所說並不反對基本人權這一點而心靈稍得補償以外，通篇所表現的是觀念模糊，思路不清，東扯西拉，滿紙浮詞泛語，尤其動輒引用權威來壓人，這實在使人失望！

話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二重大問題，以就教於讀者

和中國國民黨賢明的諸君子。

張氏的講話「民主政治三大真諦」刊載於《政論周刊》。為張氏講話辯護的文章出現於《中國一周》週刊。這兩個刊物雖標明「中國新聞出版公司發行」，但很多人知道是與中國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張氏是中國國民黨前任的祕書長，現任的中央常務委員，又是自由中國政府的教育部長。我們現在要問：張氏的這種「民主理論」，是純粹以個人身份發出的呢？還是以自由中國政府教育部長的地位發出的？抑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地位發出的？

本刊只談事理，不以任何個人為對象，絕不攻擊任何人身。此一原則，自出刊七年以來，諒為公正讀者所共見。同人與張氏個人更無絲毫恩怨可言。因此絕無以張氏個人為抨擊對象的意思。假定張氏不以教育部長的身份對海外華僑青年將「民主」作那種駭人聽聞的解釋，而只出之以平民身份，我們也就不把這事看的如此嚴重。因為，我們提倡民主，尊重各人的言論自由。反正社會上流行的奇怪言論甚多。張氏多添加一種，也無礙於天地之大，無妨於言論之眾。無如張氏係以自由中國教育部長的身份發出此言，於是他的言論正確與否，關係乎國際視聽，牽涉到海內外對整個自由中國的印象。這就與私人發言不能相提並論。張氏對民主的解釋之荒謬，稍有常識的人都可看出。假若海內外人士不幸「以偏概全」，以為自由中國政府的官員上上下下都是這個調調兒，則所招致之損失，豈非自由中國全體？凡屬自由中國的國民，為了自由中國的前途和利益，不能不對張氏此言寄予嚴重的關切。我們司言責者當然更不能明知其誤謬而隱忍不言。

中國國民黨是歷史悠久的堂堂執政黨；而且它現在正負起

領導全民反共抗俄及建立自由民主國家的重大責任。此時此日，國家的形勢到了這個地步，環顧日在發展中的國際局勢，回憶過去，展望將來，凡屬稍有常識的黨人，都不能不勾起一點「危亡之感」，和「憂惕之心」，對任何言行都出之以理智和謹慎而又客觀的態度；決沒有一心以為有恃而無恐，我行我素，自說自話，糊塗顛頂，自我陶醉，一味只求表面鋪張揚厲之理。像張氏這種言論，關係乎其本人者實小；關係乎中國國民黨聲譽者頗大。中國國民黨既是自由中國的執政黨，而海內外中國人士無不對民主之實現抱最高的熱望。因此，海內外中國人士對中國國民黨實現民主的意向如何，渴求洞悉。假定張氏所言確乎代表中國國民黨，而張氏對民主的解釋又與極權統治毫無不同之處，則中國國民黨實現民主之誠意為何，天下之人立即由張氏之言而洞悉底蘊。這麼一來，遭受損失的，似恐不止張氏一人而已。所以，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黨對張氏此言應有一明確而正大的表示。

——原載《自由中國》，卷15期8（臺北：1956年10月16日）

不要怕民主！

在反共制俄的民主陣營裡有一種奇異的現象。這種奇異的現象，我們認為明白陳示出來，比諱疾忌醫，要有利於反共制俄的前途些。現在有若干人固然不是沒有致力反共，可是他們一聽到反共必須實行民主，心裡就大不自在。有些主持反共的人士甚至以為提倡民主者是他們「潛在的敵人」。他們竟把「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視同一丘之貉。因此，無論在言論和行動方面，或是在情緒方面，他們對於提倡自由民主的人，總流露著一股仇視和憤懣的意味。顯然得很，這種情形之存在，是足以分散甚至抵銷反共力量的。

這種情形之所以構成，因素當然很多。不過。最基本的原由，還是利害之心在那裡作怪，尤其是權力欲在那裡作怪。若干主持反共的人士所孜孜在念者，惟恐在實行民主的過程中，他們的權力被消散。從表面說來，這些人士自命為「負有神聖的歷史使命」；可是，在骨子裡的算盤，則是反共不可無我。如果反共

而又使我得以在反共過程中延續下去或至壯大起來，拿反共的客觀形勢來營養主觀的權力統緒，那末這種反共是最可人意的反共。如果從事反共，但在反共的過程中逐漸消解了我的權力統緒，一切走上了「脫離掌握」之路，以致汨沒了「我」的存在，那末這種反共是不太令人稱意的。照這一部分人士看來，反共而走民主的路線，勢必發生這一結果。因此，他們對於談民主反共，深懷戒心。由這一戒心，他們發展出一種辯飾的「理論」，說民主有害於反共。為了支持這一「理論」，他們又提出在大陸失敗的往事當作有力的佐證。目前，這一套說法，正在若干人之間盪漾著，阻滯著民主的展進。

但是，從反共國際的形勢看，民主的浪潮正是波瀾壯闊。這一壯闊的波瀾不僅再度堅定著自由世界人民的信念，而且正在衝激著鐵幕深處。東歐人民之掀起巨大的感應，是很顯著的事實。從自由中國內部看，民主自由的要求，也正與日俱增。身臨這一客觀形勢發展中的反共而又反民主的人士，即使是最主觀用事的，對此情此境心中也不能沒有一個數。所以，他們雖然心中不憚於民主，但口中又不便公開明言。這一事實於是構成一種主客的衝突。陷入主客衝突之中的反共人士，水土不服，冷熱不調，於是對民主自由，表現在行動上的，是忽進忽退，忽倨忽恭，忽即忽離；表現在言論上的，是訾訾扭扭，陰陽怪氣，前後矛盾，莫知所云。

我們試行檢閱時下一部分主持反共的人士之言論，便可證明這種情形。

最近有頭腦比較冷靜的人士提醒大家，不必侈言「革命」，而須致力法治以俾建造近代化的國家。這本是稍有現代知識者的

老生常談，低調之至。不料這種低調甫出，馬上招來一陣「革命」高調：「我們反對那些取消革命的論調。取消革命就阻止反攻。取消革命就是放棄大陸上反共抗暴的群眾。取消革命就是穩定共匪的鐵幕和極權主義的暴政。取消革命就對不住匈牙利及其他俄帝附庸國的革命群眾，更對不住俄帝共匪奴役宰割下的大陸同胞。」又說：「這是反共抗俄的革命時代，也正是我們國民革命飛躍進展的時代。海內外愛國志士們！我們大家在國民革命的道路上攜手前進！」

這一番話，真是典型的「革命文學」！可惜太講究修辭了！當今之世，修辭太美的語言，我們要接受的時候，難免唯恐過於幸運，頭獎會從手上溜走。「革命」一詞，在三十年前，許多人聽到，血液流行的速度可能增加。然而，三十年來的事實表現，使稍有閱歷的人聽到「革命」二字只有血液凝結。若干職業革命家為一種「泛革命主義」（pan-revolutionism）所迷。他們把「革命」視作符咒，以為一談「革命」就可以領導群倫，就可以能人之所不能：發展所及，幾乎成了革命巫術。但是，巫術也有失靈的時候。現在到了二十世紀原子時代，解決問題要靠知識與技術。「革命」口號中如何產生知識與技術？

而且，沒有任何名詞是可以漫無限制地應用的。一個名詞漫無限制地應用，像衣服穿得太久會破一樣，會減少它的效力的。至少，從政治的意義說，「革命」一詞所指是在野群眾對在朝當權者採取非常的手段來實現政治變革而言的。這就是以下對上的一種關係。目前共黨竊據大陸，我們要剷除它，這能說是以下對上嗎？

復次又有人指陳「共匪政治攻勢的兩面」。這一指陳表示共

黨的「民主鬥爭」與「自由主義」不同；但是，居然同時又把二者相提並論：「自由主義者亦主張政府應該容忍反對黨的存在，而共匪的民主鬥爭卻決不容忍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存在。我們可以從這裡分辨什麼是共匪的『民主鬥爭』，和什麼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雖不做顛覆工作，但『民主鬥爭』卻就是顛覆工作。」這一段話，無異於說孔子類陽貨！

稍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論調之發出，不外有兩種用意。第一種用意是想藉著將「自由主義」和共黨的「民主鬥爭」相提並論而使人對於二者發生某種微妙的心理聯想。只要這種心理聯想一經鑄成，那末反共必反民主的思想前提也就可以建立。共黨和民主一起反，結果怎樣，環觀世界大勢和內部人心背向，是不問可知的。

第二、如果作此論調者的用意，真在指出共黨的「民主鬥爭」，而不在製造「自由主義」與「民主鬥爭」二者間的某種微妙的心理聯想，那末此舉頗為令人費解。所謂共黨的「民主鬥爭」，究竟是指過去而言呢？還是指目前而言？如果係指過去而言，顯屬不通。主持反共者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三民主義中包含著民權主義。信仰民權主義者又有民權主義可資實行，何懼乎「民主鬥爭」？如果係指目前而言，那簡直是文不對題，無的放矢。因為，如所周知，共黨現階段的策略並不是「民主鬥爭」，而是所謂「和平解放」。他說「和平解放」，你說「民主鬥爭」，豈非風馬牛不相及？

若干主持反共的人士之所以既反共又要反民主，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們以為「必須用共產黨的方法來反共」才有效；而用民主的方式來反共不僅無效，反而適足予共黨以可乘之

隙。這真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項錯誤，助長了納粹，法西斯，以及在美國曇花一現的麥加錫主義！

深藏在這項錯誤背後的，有一項想法，就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或者更神祕地說，是「目的可使手段成為正確」。依據這種說法，無論手段怎樣黑暗，只要目標是光明的，手段便立刻變成光明的，因而可以放手採用。這種想法，是共黨的基本「意識形態」之一。具備這種意識形態，乃共黨對於徒眾採取黨的行動路線時之一個嚴格的要求。凡不合於這一要求者，其思想都被共黨斥為「小資產階級意識」，或「溫情主義」。多少年來，共黨藉著「目的可使手段成為正確」之說，辯飾了他所行的一切極權罪惡，而使千千萬萬好人誤入了害人之路！

我們必須明瞭，古往今來，在一切大變革之中，所標尚的「目標」，無一不是遠隔塵寰的理想；而實現這些理想的手段，才是實際的東西。千千萬萬人在最大多數的時間裡所實際接觸的，並不是那遙遠的美麗理想，而是強有力者施用某些手段時所產生的具體影響和決定。因此，如果理想的目標光明而且達到這一目標時所採取的手段也光明，那末大家切身感受到的就是光明。如果理想的目標是光明的而達到這一目標時所採取的手段是黑暗的，那末大家切身感受到的就是黑暗。共產黨統治的方法極其苛煩、殘酷、和恐怖。如果反共者用共產黨的方法來反共，那末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怎能不是苛煩、殘酷、和恐怖呢？假若如此，那末反共之事對於千千萬萬的人有何實際價值可言呢？假若因此而打擊了千千萬萬人的反共意志和情緒，那末豈不是自毀長城？豈不是自行斲喪了反共的有生力量？

這樣看來，如果拿共產黨的方法來反共，那末是可以從根子

上實際地取消反共目標的。這種辦法孕育著自我毀滅的種子。從經驗的觀點看去，反共的手段必須與目標一致。手段與目標一致的反共，就是民主的反共。世界民主潮流發展到了今天，人民的醒覺程度是如此日漸增長，那些小動作，小見識是沒有用的了。空喊「革命」，大言欺世更是徒徒暴露內心的空虛。小孩子們在溪中作個泥堤，擋得住急流幾時？逆乎潮流，逆乎人心來行事，總是吃力不討好的。順著民主潮流和人心之所向來反共，真是順理成章的事。做順理成章的事者，是不愁被時代遺棄的。多一分正面的努力，就多一分質實的收穫。又何懼乎不被時代所選擇呢？

迎接民主，不要怕！

——原載《自由中國》，卷16期1（臺北：1957年1月1日）